

当代政治理论

〔联邦德国〕克劳斯·冯·柏伊姆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当代政治理论

〔联邦德国〕克劳斯·冯·柏伊姆 著

李 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 年·北京

Klaus von Beyme
DIE POLITISCHEN THEORIEN DER GEGENWART

R. Piper & co, Verlag, München 1980

根据慕尼黑 R. 皮珀尔联合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DĀNGDÀI ZHÈNGZHÌ LĪLÜN

当代政治理论

〔联邦德国〕克劳斯·冯·柏伊姆 著

李 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821-2/D·6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1 千

印数 0-3,500 册

印 5.8 1/2

定价：3.10 元

译者的话

克劳斯·冯·柏伊姆(Klaus von Beyme, 1934—)的《当代政治理论》一书问世于1972年。1980年第四次重版时,作者做了修订和补充。这里是根据1980年的版本译出的。

柏伊姆生于1934年,曾先后在海德堡、慕尼黑、巴黎、莫斯科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1967年至1973年,在图宾根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74年至今在海德堡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是当今联邦德国著名政治学家之一。1983年,被选为国际政治学协会主席。1984年春,曾作为国际政治学协会主席应邀访问过我国。

他主要从事政府学说的比较研究,但对政治学的其它领域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显著的成就,是一位多产的政治学家。近年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民主政体中的政党》(1982年)和《世界政治中的苏联》(1983年)等等。

《当代政治理论》是作者对近几十年来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政治科学理论发展情况的论述和总结。但在论述时,并不着眼于对当代各种政治理论或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作一一的评述,而是抓住决定当代政治理论发展基本倾向的三个主要方面〔科学理论基础(元理论)、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当代政治理论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是理论的多元化;二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关于理论的多元化,他认为,当代的政治理论是在三种不同的元理论——规范理论、经验分析理

60715/22 21

论和辩证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竞争，但其结果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的原则：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吃掉弱者，一种理论吃掉另一种理论，而是相互接近，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对方的许多重要理论；即使是有问题的理论，也能提出有益的观点和新的富有见解的问题。因此，当代的各种政治理论，无不在相互竞争、相互吸收中使自身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关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作者首先指出了元理论和方法的一致性。当今政治科学中的五种主要研究方法，都以一定的元理论为依据，同时又促进一定的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作者看来，元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彼此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而五种研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结合起来使用的。各种方法相互交叉联系，促进了方法的多元化。所以，推动当代政治理论变化和发展的原动力，正是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并且，今后的政治理论也“必然是朝着坚定的理论多元论的方向发展”。

与作者的多元论立场相应的，是作者在分析和论述时，对各种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采取了“批判接受”、“兼收并蓄”的态度。作者既肯定了它们在政治理论发展中的贡献和历史作用，也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不足和缺陷。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当今西方政治科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史中，各种理论和学说，尤其是政治理论和学说，无不带有或明或暗的阶级的烙印，代表和反映当时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当代的各种政治理论，自然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特性。我相信，我国广大读者对该书中所作的某些分析和评价，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取舍。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献给我的姐姐吉西拉

目 录

前言	1
序言	6
第一章 政治理论的科学理论基础	10
一、规范的理论	10
二、经验-分析的理论	23
三、辩证-批评的理论	40
第二章 政治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61
一、历史的方法论	62
二、制度的方法论	70
三、行为主义的方法论	76
四、功能主义的方法论	88
五、比较的方法	102
第三章 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	122
一体化模式和秩序模式	124
一、国家	124
二、权力	134
三、政治系统	142
四、政治文化	158
五、民主	168
冲突模式	189
六、集团多元论	192

七、阶级冲突的理论	202
八、领袖人物理论	217
回顾：论政治理论变化的动力	244

前 言

本书是在我讲完“政治理论”课之后，因大学生们要求有一本“把大量材料加以压缩”并能更好地了解政治学理论概况的著作而撰写的。纳尔和纳舍尔德对现代政治理论所作的富有成就的（三卷本）概论，最初使我感到，进一步阐述政治理论是多余的。后来我改变了看法，因为有人向我指出：一部三卷本的政治理论导论，其内容似乎太广泛了，并且，这样一部三卷本的著作，不应当主要服务于教学的目的，而应当有利于批判地接受某些至今在德国仍被人们忽视的理论。对我来说，这种看法作为我撰写本书的论据，似乎更为重要。人们在评价现代政治理论时，有时就是以对这些被忽视的理论的某种认识为前提的，如果人们想要使自己的评价取得成效的话。纳尔和纳舍尔德在研究和评价现代政治理论时所追求的目标，显然是不一致的。

对一部政治学导论来讲，在理论的阐述——即对理论所归纳的政治现实的说明——和对理论的评价与批判之间，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是不容易的。无论如何，人们不应当期待一部政治理论导论象纳尔和纳舍尔德试图介绍比较政治学那样，对政治的物质领域做出完整的描述性的概括。一部著作的作者不能自夸，说自己成功地把论述中必须予以考虑的三种观点最理想地结合了起来，而应该反躬自问，能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某些研究领域，例如阶级理论、集团理论和领袖人物理论，同其他的研究领域，例如同政治系统和政治文化的研究领域相比，其概念形成的抽象水平

是较低的,因此就必然产生阐述的区别。一种基本观点对事物的理论抽象水平愈低,分析就愈明显地倾向于对象的描述。

我的论述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于迄今为止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在概述政治学理论时所确立的目的:

1. 我试图对抽象认识的层次作出比在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学理论)阐述中所作的分类更为明显的分类。在美国(学者)的阐述中,元理论的、理论的、方法论的和研究技术水平上的论证往往是缺乏联系的并列。不可否认,这种尝试有时也有某些自在的人为的东西,例如,当人们把功能主义的元理论的和理论的假设与政治系统的概念相分开的时候,或者把政治文化的概念与行为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理论基础相分开的时候,就存在着这种情况。然而,我还是做了这种尝试,因为实际研究中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只能折衷地加以使用。部分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接受,而无需同时接受一种理论的所有元理论的种种联系,就像首先在功能主义那里可以看到的那样(参阅本书第2章第4节)。

2. 有时,左的批判指责方法的多元论“缺乏任何构思”。^①如果方法的多元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不是着手于证伪,而是着手于以鲍波尔的名义去诽谤其他方法,那么方法的多元论就背离了它的科学理论基础。从方法多元论的立场出发,各种理论和方法将不仅仅是按照它们的逻辑结论,而且也将按照它们对具体的研究工作的有效作用来评价。方法多元论必然首先涉及到如何对待科学理论讨论所面临的政治科学专业的狭隘界限的问题,同时也必须对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主要倾向保持距离的规范论者和辩证主义者的贡献作出正确评

① 勃伦泰诺:《科学的多元论》,载《论证》1971年第66期第476—493页。

价。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方法多元论,特别是元理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地选择方法和自封为方法,并不意味着作者本人的态度是多余的。我的观点同过去一样,是一种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尽管我的批评者们在70年代有时还指责我适应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比较晚”。^①然而,我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始终是同拉卡托斯^②所代表的观点是一样的;而拉卡托斯同鲍波尔的观点是对立的,他反对严密的证伪主义的-杀人-行为-理论,并且认为,真正的(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建设性的批评并借助于竞争性的研究计划”才能取得。^③因此,在我看来,朝着坚定的理论多元论的方向发展是愈来愈明显的事实。这种理论多元论并不惧怕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接触,即使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领域中是站不住脚的。我所选择的这些观点,自本书第一版以来,得到了P·费尔邦德和H·斯品纳的进一步发挥。费尔邦德在成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前,曾宁愿把公民的首创行为,而不愿把科学理论家视作理论的裁判官。我作为一位非哲学家,今后必须仍然是斯品纳善意地所称呼的、科学理论争论中的“局外人”。^④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会被批判所吓倒,去选择另一种既定的观点。此外,政治学理论分析的观点有充分的理由,既不赞同鲍波尔的,也不赞同库恩的关于理论的进步和发展的概念。他们的观点过分地带有自然科学史的特征(参阅本书最后一章的有关阐述)。因此,在本书中,我必须谈到许多理论,尽管我认为这些理论本身和它们的元理论的基础是成问题的。H·斯品纳说:“多元论接受人们检验的过程,必须

① J.席斯勒:《社会主义问题,对K.冯·柏伊姆两篇新的政治学著作的批判》,载《历史和社会》1979年德文版第140页。

② 拉卡托斯(1922—1974),出生在匈牙利的科学哲学家。——译者

③ 拉卡托斯和姆斯戈拉夫主编的《批判和认识的进步》,1974年德文版第173页。

④ 斯品纳:《多元论是认识的模式》,1974年德文版第234页。

是公开的,并且随时都可以进行。总的讲,必须更侧重于以改进和充实各种观点为目的,而不能以检验出一时在选择上出现的缺陷为目的”。^①对于有争论的和部分几乎是无法调和的理论的讨论,即使从教学的理由来看,也不是多余的,因为,多数大学生,在她们为自己作出进一步研究的决定之前,总想了解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并且,在坚信元理论的大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始终有兴趣同对立的观点进行争论,这是令人欣喜的。

3. 不能把 20 世纪以前的政治思想史作为经验理论形成的史前史而全盘加以排斥;不能忽视现代模式同旧的思想理论的种种联系。然而,我同样不赞成某些规范论者的“世界上研究方法中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说法。在这些规范论者看来,思想史有时起着反击现代政治理论进攻的纯武器库的作用。

4. 为有用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理论所作的努力,不应当沉醉于某些科学主义者的纯方法论之中。在这些科学主义者看来,逻辑的明晰性或工艺的可使用性似乎高于其它价值,例如高于“社会关系”和“人道主义”。科学方法和思想理论被看成是它们与社会利益和权力结构以及科学活动利益的联系,而无需把这类联系的证明用来拒绝作为明确地确定为意识形态的既定方法。纯方法论者们反对用任何知识社会学来说明统治结构和交往结构的影响,否认这种影响是一种与科学逻辑的规律不相适应的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他们似乎坚信:有必要说明一个既定历史和社会联系中的各种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危险。但是,这种说明却并没有说出科学论述的法律有效性有什么道理来,因为理论的形成和使用,从来都不是与它的科学的内涵相一致的。

^① 斯品纳:《科学和实践中的理论多元论》,载《医学中的多元性》1980年德文版第46页。

5. 一部不放弃自己观点的著作,诚然不能提出发展自己牢固的政治学理论的要求。即使是比较全面的、把自己理解为“政治的经验理论”的著作,例如C.J.弗里特里希的《人和他的政府》(1963年版)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甚至,连规范论者都不曾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虽然对他们来讲,做到这一点,比较起来似乎是最容易不过的。只有在从伊斯顿以来的一些系统理论家那儿,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体化的政治学理论概貌。然而,即使是系统理论家们,也仅仅是不完全地完成了这种政治学理论的框架。政治学理论虽然在各个领域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作为一般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学理论或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比较,仍然是比不上的。然而,研究各个政治领域中的众多理论,并不太早。此外,我信服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政治世界的错综复杂性,而不是过分地急于通过某些“一般理论”来缩小这些复杂性。

我把这本书看成是对政治科学在唯科学主义和常识性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探讨的尝试;唯科学主义研究科学仅仅为了科学家,而常识性的意识形态不愿承认科学理论对日常语言和所经历的事物的相对的独立性。这本书不应当为了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哲学的利益而重新抛弃现代理论、方法和研究技术的成就。但是,本书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和哲学在科学结论的应用方面,在面临技术至上的威胁的实践中,对假设的形式和目标的确定上所做的贡献,不应当把批判性的探讨各种理论和为社会的人道化所作努力的重要性统统诬蔑为“科学的狂飙”。

克劳斯·冯·柏伊姆

1979年12月于海德堡。

序 言

理论应当被称为一种概括性的命题。这种命题强调的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事物、活动或事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发生的变化。因此，一种理论包含着三种要素：

一、一个关于政治现实的某一既定部分的、相互关联的陈述系统；

二、关于先决条件和次要条件的说明，在这些条件下，这些陈述应该发挥作用；

三、形成关于未来事件和变化的假设的可能性。

理论的这种政治功能和预测功能，同辩证的和历史的理论的历史预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经验的理论始终只能推论出如果 - 那么这类命题；这些命题精确地说明某一既定的变化能够赖以产生的先决条件，而历史的预言则是无条件的。

一种反复被证实了的理论，常常被称之为一种规律。一种需要继续加以检验的理论，常常只能称之为假设。然而，批判理性主义却不承认已被证实了的理论。在它看来，任何理论，即使被验证过一百次，仍然是应该能证伪的。真正说来，只有证伪。因此，在新实证主义者看来，“某一理论X已由某种研究Y所证实”这种不严密的命题，从逻辑上讲是荒谬的。

政治理论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然而，政治科学中理论形成的可能性，同其他科学是不一样的。甚至，最初从哲学的社会理论中分离出来的种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它们所

喜爱的抽象阶段也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些抽象阶段中，有三种不同的理论：

- (1) 构成政治科学中研究主体的各种概括性理论；
- (2) 局部理论(例如，关于非选举人或者更换选举人的理论)；
- (3) 关于整个政治系统的一般理论。

然而，即使像“政治系统”这样的概念，同社会学中的“社会系统”这个概念相比较，其综合性相对来说是很少的。政治科学研究的观念，相对而言，很少综合性这个经验，使不同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们得出这样的论断：政治科学是一种“非理论性的科学”。因此，帕森斯和E·希尔斯在国民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给予国民经济学的学说以一种明显的更高一级的理论地位，因为在国民经济学的学说中，大部分的学说似乎得到了考虑，并且，(国民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对比较一般的行为理论来说似乎是适用的^①。

尽管在建立政治理论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些困难，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羡慕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抽象的模式结构，受到了多方面的批判。许多政治学家从具体问题中获得了对建立政治理论的更加强有力的认识，即使在这些政治学家中，有的并不属于作为实践哲学的正统的政治追随者，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使人们有可能比较容易地正确对待批判理论的重大问题。在努力建立同实践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时，政治科学和经济学这两门科学今天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因此，在概括论述政治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时，在检验各种不同的政治科学著作所使用的方法时，我们必须防止骄傲。虽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导论都强调指出：理论对各种社会现象

^① 帕森斯和希尔斯：《论行为的一般理论》，1954年英文版第28页。

所做的抽象认识，其水平是不相同的，甚至人们也经常利用“描述性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但是，在进行论战的时候，人们却往往采取否认一种见解具有理论特征的手法。

政治科学理论一再受到指责，人们说它是“无关紧要的理论”，在政治理论的最初创立者的自我理解中被称之为理论的陈述体系，只能被视为一种“分析模式”^①。以这种苛刻的要求为衡量标准，一切所谓理论的大多数，就都可能被当作单纯的分析模式，因为它们多数没有越过假设形成的最初阶段。于是，不仅那些对事物所做的、抽象水平比较低的综合认识可能被排除在理论概念之外，而且，正是那些对事物所做的抽象水平最高的一般理论，也可能被排除在理论概念之外。理论评论家们多数都承认，帕森斯的系统理论也仅仅是为经验的和分析的假设的形成提供了“框架”。然而，似乎任何人都不否认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具有理论特征。

不那么苛刻的理论评论家也许会把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作为理论的尺度。然而，以这样的尺度作为衡量标准，方法上很自觉的并且建立在高度反思水平上的经验研究，至多包含着不同的理论成分，这个论断似乎并不会减少经验研究所获得的大量科学成果。过去，许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经常是大于它们方法上的精确性和理论的坚实性。方法上的严密性还特别受到评论家们的推崇，然而，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只能是部分地坚持这种严密性。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对各种著作在科学交往系统中所起作用的考虑，来排除对各种著作的不公正的评论。这正是许多评论家批评（政治科学）著作所忽视的方面，他们不考虑接受这些著作的读者面和某些著作应起的教育作用。但是，当作者或者出版社

① 纳尔、纳舍尔德：《现代政治理论导论》（三卷本）第3卷，1971年德文版第212页。

的宣传提出了错误的要求时，人们提出尖锐的批评是合适的。对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科学著作，可以作为资料汇编和手册；作为入门的教科书，或者作为通俗读物；作为提出理论假想，或者强调某种思想的重要的临时评论；甚至可以作为科学的论战文章，作为并不要求制订相反命题的持续性的评论而在科学的交往系统中具有某种功能。对政治学研究者们的理论设想所做的一切批判性的说明，都必须在这个范围内加以理解，政治学研究者的功绩决不应当用简短的评论——在这篇前言中我也许是作了这样简短评论——予以全盘否定。